

# 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赋能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基于调节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陈会方

**[摘要]** 数字经济借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助力经济增长与城乡协同发展。但是，区域发展差异或引发“数字分群”，加剧财富分配不均，需平衡发展才能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基于2014—2023年中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共同富裕内涵出发，构建综合指标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同时，借助实证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异质性，并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调节门槛变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正向推动共同富裕，但存在区域和五个子系统之间的异质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调节和门槛作用，能够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 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 陈会方，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21。

**[中图分类号]** F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5）05—0125—13

##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共同富裕，不单单是追求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更要体现富裕度、共享度、共同度及可持续发展。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与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驱动经济增长与城乡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sup>①</sup>然而，由于各地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引发“数字分群”，进而导致群体分化，加剧财富分配不均，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构建衡量共同富裕的综合指标，就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展开深入研究。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事实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缓解市场分割现象，促使要素资源有序流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推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会放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能够持续放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为此，本文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调节门槛变量，探讨数字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共同富裕三者间关系。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共同富裕展开研究。一是共同富裕的测度研究。高鹤鹏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在2008—2021年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2021年时绝大部分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已成为正值。<sup>②</sup>杨懿和张婧怡从富裕度、共同度两大维度出发，发现研究期内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但仍存在极化现象。<sup>③</sup>赵德昭等从县域角度出发，发现全国范围内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均显著提升，各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但整体水平不高。<sup>④</sup>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协同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研究”（项目编号：22BKS193）。

① 田瑶、郭立宏：《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经济问题探索》，2024年第2期。

② 高鹤鹏、宋玉冰、丘斌等：《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格局分析》，《统计与决策》，2024年第13期。

③ 杨懿、张婧怡：《中国共同富裕指数：体系构建与测度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6期。

④ 赵德昭、陈可佩、韩宁等：《中国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与时空演变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24年第6期。

二是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韩先锋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数智化有利于提升城乡共同富裕水平。<sup>①</sup>盛明泉等指出，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显著正向促进共同富裕发展，而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还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sup>②</sup>周科选和余林徽则探索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sup>③</sup>由此可见，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关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从如下两方面着手。一是直接影响：金殿臣等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效果；<sup>④</sup>贾曼莉与宋孜涵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布特征；<sup>⑤</sup>余志文和周慧认为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共同富裕。<sup>⑥</sup>二是间接影响：学者以机会不平等、<sup>⑦</sup>产业结构升级、<sup>⑧</sup>农村要素配置<sup>⑨</sup>作为机制变量，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此外，已有文献还指明统一大市场能够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共同富裕。<sup>⑩</sup>那么，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尚需严谨的实证研究才能回答该问题。

综上，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较为丰富，为本文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丰富的研究空间。其一，多数研究主要借助省级面板数据，对共同富裕展开分析，鲜有学者从城市层面测度共同富裕水平。其二，现有关于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一定差异，有待进一步丰富。其三，较少有文献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一是在研究数据上，本文采用2014—2023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研究，为共同富裕相关研究提供更多样本支持。二是在指标体系构建上，本文融合现有研究成果与理论内涵，从富裕程度、共享水平、共同特质和可持续性四个维度搭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三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纳入同一框架，并引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调节门槛变量，以更好地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全新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直接影响与区域异质性

2021年，国务院在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数字化服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以数字化服务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破除信息屏障，可推动知识溢出效应与技术扩散进程的加速，促使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重组，形成全新经营模式与经济业态，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倍增效应。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就业水平提高，带动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sup>⑪</sup>

① 韩先锋、肖坚、宋文飞：《数智化与城乡共同富裕：来自村级微观空间的证据》，《财经科学》，2025年第5期。  
② 盛明泉、鹿晓晴、胡中应：《新质生产力对地区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华东经济管理》，2025年第5期。  
③ 周科选、余林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④ 金殿臣、刘帅、陈昕：《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276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⑤ 贾曼莉、宋孜涵：《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经验证据》，《价格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8期。  
⑥ 余志文、周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  
⑦ 周利、尤济红、冯大威：《数字经济发展、机会不平等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职业流动的视角》，《南开经济研究》，2024年第9期。  
⑧ 李春林、陈慧、张鸣亚等：《浙江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经济地理》，2024年第10期。  
⑨ 张应良、杨飞韵：《数字经济、农村要素配置与农户共同富裕——基于增收和缩距双重目标的审视》，《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⑩ 薛军、郑毓铭：《统一大市场与共同富裕：基于地区的视角》，《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⑪ 张翔、冉光和：《财政金融协同如何驱动县域共同富裕——内生集约与外源竞合的研究视角》，《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必然会经历从初创到衰退的客观周期。在此条件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换言之,在数字经济发展前期,数字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普惠性特征明显,可助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共同富裕。伴随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新模式与新业态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在实现就业目标的同时,还可有效调整市场要素分配,<sup>①</sup>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在短期内和长期间均可正向推动共同富裕。但鉴于中国区域间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各地在数字基建、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鸿沟,且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亦呈现不均特征,这可能导致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一,欠发达地区数字禀赋不强,这一地区的人们较难在短期内快速掌握智能科技产品,一定程度上导致区域发展较为缓慢,<sup>②</sup>弱化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效果。其二,发达地区具备扎实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大量数字经济企业,在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以及使用大数据方面有优势,<sup>③</sup>可稳步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推动区域内尽早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基于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 (二)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

共同富裕是指消除贫富差距后的普遍富裕,不仅要考虑经济总量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还要考虑分配的公平性。为此,本研究参考祁芳梅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将共同富裕分为富裕度、共享度、共同度及可持续发展四个子系统,<sup>④</sup>分别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效应。

### 1. 数字经济对富裕度的作用路径

一方面,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赋能富裕度提升。数字经济有利于产业集聚与融合,催生直播带货、网约车等新型就业岗位,有效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进而提高居民富裕度。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约束与信息约束,降低居民申请贷款的交易成本,提高贷款申请意愿,充分缓解传统贷款的资金约束。<sup>⑤</sup>这有利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与财富积累,提高居民富裕度。此外,借助互联网设备,居民还可突破时空限制,以较低成本获取生产生活信息,为家庭富裕度提升提供信息支持,从而带动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通过转变消费观念提升富裕度。中国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相对滞后,未能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形成了结构性矛盾,致使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然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全新消费模式,促使居民消费方式由线下转变为线上。<sup>⑥</sup>在此背景下,消费者的消费场域得到极大拓宽,能够打破时空限制相对自由地开展消费活动,有效满足自身消费需求。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还可依托互联网进一步放大居民线上消费的“示范效应”,有力转变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推动消费率与富裕度提升,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 2. 数字经济对共享度的作用路径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更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供给水平偏低等短板依然存在,对实现共同富裕产生一定阻滞作用。而数字经济可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带动经济“共享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保障。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利于重构政府治理模式。伴随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公共管理平台规则监管、服务等多方面日益趋于数字

① 卢江、王煜萍、郭子昂:《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检验——基于马克思两部类生产模型的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2期。

② 武赫、周雯琪:《高质量与共享发展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经济问题》,2025年第2期。

③ 孟维福、刘婧涵、杨天宜:《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经济问题》,2024年第11期。

④ 祁芳梅、吴文菲、徐庆等:《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21期。

⑤ 周利、吴雨、易行健:《数字经济发展、资产配置效率与居民财产性收入——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金融研究》,2024年第6期。

⑥ 杨守德、周正国:《数字经济、流通业集聚与农村消费升级》,《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化,使政府治理模式得以重塑,<sup>①</sup>大幅提高居民“共享度”体验。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政府公共管理平台还可动态掌握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并结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差异化服务,<sup>②</sup>以推动共享度提高。由此,政府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强化行业发展顶层设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式发展,巩固共同富裕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利于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社会保障工作逐步向数字化转型,可实现社会保障业务在省内无差别受理,推动社会保障业务共享发展,进一步夯实基本公共服务,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借助数字技术构建社会保障业务、财务、档案等多方面一体化管理体系,推动社会保障数据“准”“实”归集共享,助推搭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数字全景图,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坚实基础,以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3. 数字经济对共同度的作用路径

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蛋糕”质量,努力缩小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提高共同度。换言之,就是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为农村生产、就业及生态建设赋能,使农村地区获得“后发优势”,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sup>③</sup>进而提升共同度水平。此外,数字经济借助信息匹配优势,能够有针对性地降低创业融资成本与金融服务门槛,切实提高创业群体积极性,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跃度,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有力缩小城乡差距,<sup>④</sup>实现共同富裕。

4. 数字经济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路径

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快速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细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加快数据、算法、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要素集聚,推动劳动力突破时空限制进行转移与流动。<sup>⑤</sup>这能充分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实现社会财富不断创造与累积,为持续推动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伴随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数字医疗行业迅速崛起,大幅提升了居民健康福祉,赋能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进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可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但作用程度有待进一步验证。由此,提出假设H2。

假设H2:数字经济可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但作用程度不一。

(三)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门槛调节作用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以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为原则,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与社会分工形成的全国一体化运行的市场体系。<sup>⑥</sup>该体系旨在打破区域间市场壁垒与制度性障碍,构建标准统一、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现代化市场格局,通过优化市场运行规则与治理机制,实现商品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顺畅流通、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与整体竞争力。就理论而言,较严重的市场分割与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机会的降低,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打破地区间隐性政策藩篱及壁垒,推动数据要素进一步优化,缓解市场分割,<sup>⑦</sup>促进要

① 张红凤、黄璐、葛仟慧:《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优化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改革》,2025年第3期。  
② 张海峰、王丽、刘春雪:《省以下财政压力与环境污染的“虹吸效应”:区域一体化均衡治理视角》,《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  
③ 伏开宝、曾建中、朱保华:《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研究——基于创业活力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上海经济研究》,2025年第5期。  
④ 李梦娜、周云波、王梓印:《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基于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调节效应》,《财经科学》,2025年第4期。  
⑤ 王思、张伟盼:《数字经济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视角》,《南方经济》,2025年第5期。  
⑥ 王珍珠、袁平红、周明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财经科学》,2025年第2期。  
⑦ 崔建军、张佩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交易效率的机制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5年第5期。

素市场公平竞争，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强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之下，中国分配格局及分配制度将逐渐完善，使得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扩大。此外，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同阶段，其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调节作用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发挥积极作用是本文的关注点之一。以此为基础，提出假设 H3。

假设 H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使其具有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CP）

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之前，需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量化。为此，从共同富裕内涵出发，结合周亚虹、<sup>①</sup> 贺建风<sup>②</sup> 以及谢向伟<sup>③</sup>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可得性，从富裕度、共享度、共同度、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见表 1）。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对共同富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

表 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富裕度	经济发展	人均 GDP（万元）	+
	居民消费潜力	人均消费支出（万元）	+
	居民生活质量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居民消费水平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
共享度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
	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辆）	+
	医疗健康	人均医疗床位数（个）	+
	文化教育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共同度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万元）	-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万元）	-
	区域协调	全国/省份内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差距（万元）	-
		全国/省份内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万元）	-
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率	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	+
	人口年龄结构	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值（%）	+
	发展型消费	家庭年人均教育、交通、医疗保健消费均值（万元）	+
	科技创新	专利授权数（项）	+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

现阶段，学术界针对数字经济水平测度的研究较为丰富，能够为本文提供一定理论参照。为此，借鉴纪玉俊等学者已有研究成果，<sup>④</sup> 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维度，系统构建数字经济

① 周亚虹、邱子迅、姜帅帅：《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电子商务与数字金融协同视角》，《经济研究》，2024 年第 7 期。  
② 贺建风、周玉兰：《数据要素市场化、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共同富裕——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经济问题探索》，2025 年第 5 期。  
③ 谢向伟、张莉沙、张应良：《数字贸易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国际经贸探索》，2025 年第 3 期。  
④ 参见纪玉俊、尚嘉琳：《数字经济影响下的产业协同集聚：红利抑或陷阱？》，《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3 期；张莉、陈凯、张杨：《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25 年第 5 期；李震、昌忠泽、戴伟等：《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了吗？——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评论》，2025 年第 4 期。

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2）。为客观量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说，运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算。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个）	+
	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
	移动电话基站数量（个）	+
数字产业化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	+
	软件产品收入（万元）	+
	电子信息服务业产值（万元）	+
产业数字化	高技术产业R&D项目数（个）	+
	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	+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	+
	每百家企业拥有的网站个数（个）	+

3. 调节门槛变量：全国统一大市场（MI）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结合前文理论，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调节变量与门槛变量，同时参考赵静梅等的研究方法<sup>①</sup>，采用相对价格法获取主要品类<sup>②</sup>商品价格，进而构建市场统一指数。该指数越高，说明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即全国统一大市场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4. 控制变量

为更好探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控制以下可能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变量：（1）产业结构合理化（TL），以泰尔指数的倒数表示；（2）政府干预（Gov），用公共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征；（3）教育发展水平（Edu），通过地级城市拥有高等院校数量刻画；（4）人力资源水平（Hc），以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的对数衡量；（5）贸易开放程度（Open），利用各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4—2023年中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研究，相关指标以2014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数据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医疗保障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交通中国统计年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经济是否显著影响共同富裕，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P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_{it} + \alpha_2 X_{it} + \epsilon_{it}$$
 (1)

式（1）中，*i*、*t*分别代表地区与年份，*CP<sub>it</sub>*表征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Dig<sub>it</sub>*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X<sub>it</sub>*表示控制变量集，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政府干预、教育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水平与贸易开放程度。*α<sub>0</sub>*代表常数项，*α<sub>1</sub>*与*α<sub>2</sub>*分别代表变量系数，*ε<sub>it</sub>*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分析

为探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表3中的列（1）仅检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发现影响系数为0.533，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3中

① 赵静梅、李钰琪、钟浩：《数字经济、省际贸易成本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学家》，2023年第5期。  
② 主要品类包括：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体育娱乐用品、日用品等八大类。

的列（2）展示了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0.487，尽管较列（1）数据有所降低，但仍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正向推动共同富裕。由此，假设 H1 得到初步验证。究其原因，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数字技术可倒逼劳动者展开技术技能学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加速实现共同富裕。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Dig</i>	0.533*** (6.95)	0.487*** (6.58)
<i>TL</i>		0.269*** (4.28)
<i>Gov</i>		0.173** (2.26)
<i>Edu</i>		0.086** (2.33)
<i>Hc</i>		0.091** (2.22)
<i>Open</i>		0.312*** (3.25)
<i>con<sub>1</sub></i>	1.235*** (6.30)	1.044*** (5.44)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90	2690
<i>R</i> <sup>2</sup>	0.612	0.705

注：\*、\*\*、\*\*\*分别代表 10%、5% 与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从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0.269，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越强。可能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越能充分释放地域优势与特色产业优势，并通过资本积累带动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0.173，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政府干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推动作用。这是由于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以此加速促进共同富裕。教育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教育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能够促进教育在区域、城乡、校际之间优质均衡发展，促使人们享有平等受教育权，以此加快人才培养，助力共同富裕。人力资源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0.091，在 5% 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水平提升有利于激发居民活力与创造力，深挖人才发展潜力，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贸易开放程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 0.312，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能有效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究其原因，贸易开放程度提高能够倒逼新一轮改革，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优化民生产品供给，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此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 （二）异质性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把 269 个地级市所属的省（区、市）划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展开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从中不难看出，数字经济对中国共同富裕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存在东部、中部影响显著，西部与东北影响较弱的区域异质性。细言之，东部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共同富裕，而西部与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假设 H1 得到全部验证。究其原因，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与创新水平较强，且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具备较强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依托



数字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日渐提升，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中部地区农业资源丰富，具备实现绿色发展的产业基础。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可助推中部地区农产品数智化发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西部地区数字资源禀赋相对较差，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创新水平较弱，难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尚存在数据资源共享、大数据深加工实现困难等问题，难以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加速共同富裕进程。

表 4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i>Dig</i>	0.535*** (7.14)	0.460*** (4.76)	0.447** (2.26)	0.411** (2.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ub>-</sub></i>	1.325*** (6.51)	1.108*** (6.42)	0.846*** (5.99)	0.751*** (5.78)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60	800	690	340
<i>R</i> <sup>2</sup>	0.718	0.676	0.654	0.639

（三）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

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分析数据可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由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具言之，数字经济在 1% 水平上正向影响富裕度、共享度、共同度子系统，在 5% 水平上影响可持续子发展系统。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数字经济有力转变了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催生了多样化的消费方式，释放了多元消费需求，从而有效提升了消费率，提高了富裕度水平。二是数字经济发展使得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等趋于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了政府服务水平，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共享度水平提升。三是数字经济依托普惠特性，能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融资成本与金融服务门槛，有力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强化了共同度。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了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还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表 5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富裕度	共享度	共同度	可持续发展
<i>Dig</i>	0.426*** (5.94)	0.433*** (5.22)	0.415*** (4.87)	0.401** (4.6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ub>-</sub></i>	1.641*** (5.94)	1.536*** (3.11)	1.339*** (3.15)	1.242*** (3.22)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90	2690	2690	2690
<i>R</i> <sup>2</sup>	0.749	0.757	0.722	0.702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1. 调节效应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中国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同类产品价格差异可能会导致市场分割现象出现，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阻碍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区域异质性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且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表 6 数据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意味着全国统



一大市场能够推动共同富裕。因此, 需要进一步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在式 (2) 中加入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交互项  $Dig \times MI$ , 并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CP_{it} = \beta_0 + \beta_1 Dig_{it} + \beta_2 Dig \times MI_{it} + \beta_3 X_{it} + \nu_i + \mu_i + \epsilon_{it} \quad (2)$$

式 (2) 中,  $Dig \times MI_{it}$  表示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交互项,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i (i=1, 2, \dots, n)$  为变量系数,  $\nu_i$  与  $\mu_i$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其余变量及符号定义不变。

基于式 (2), 得出调节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7。分析表 6 中的列 (1) 发现, 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交互项系数为 0.518,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意味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由此, 假设 H3 得到初步验证。究其原因,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缓解市场分割, 放大创新收益, 缩小不同群体收入差距, 进而深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调节效应
$Dig$	0.476*** (6.25)
$Dig \times MI$	0.518*** (7.01)
$MI$	0.466*** (5.74)
控制变量	控制
$con_{-}$	1.365*** (6.92)
个体固定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观测值	2690
$R^2$	0.718

2. 调节效应的内生性检验

为规避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由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罗长远和万斯语的方法,<sup>①</sup> 将各城市 1984 年的邮电历史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通常较高, 且从历史层面来看, 这类地区的邮电业务发展态势较好, 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准则; 二是从历史维度来看, 过去邮电业务的发展水平对当前共同富裕程度难以产生直接作用, 契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准则。

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共同富裕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7 列 (1)~列 (3) 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与数字经济呈显著正向关系, 这意味着邮电业务的显著发展, 提高了数字经济水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系数呈显著正向, 这表明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交互作用能够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影响, 即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

3. 门槛效应检验

表 7 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备较强的正向调节效应。然而, 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主要侧重于变量间线性交互关系。若全国统一大市场仅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可能会与现实情况相背离。为此, 进一步引入可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门槛效应模型, 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门槛变量, 探究其对数字经济影响效应的具体门槛, 具体模型如下:

① 罗长远、万斯语:《数字经济是否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 2024 年第 10 期。

$$CP_{it}=\beta_0+\beta_1Dig_{it}\times I(MI\leqslant\theta_1)+\beta_2Dig_{it}\times I(\theta_1<MI\leqslant\theta_2)$$
$$+\beta_3Dig\times I(\theta_2<MI\leqslant\theta_3)+\beta_4Dig\times I(MI>\theta_3)+\beta_5X_{it}$$
$$+\nu_i+\mu_i+\varepsilon_{it}$$

(3)

表 7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Dig (1)	Dig×MI (2)	CP (3)
IV	0.201*** (3.26)	0.120*** (3.17)	
Dig			0.457*** (4.82)
Dig×MI			0.473*** (4.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_	1.054*** (6.32)	1.513*** (5.20)	2.641*** (6.25)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90	2690	2690
K-P rk LM	16.156 [0.000]		
C-D wald F	36.102 {16.38}		
R <sup>2</sup>	0.691	0.712	0.761

注：[] 内代表 p 值，{} 内表示 Stock-Yogo 10% 的临界值。

此外，为考察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模型进行门槛效应检验：

$$CP_{it}=\beta_0+\beta_1Dig_{it}\times I(Dig\leqslant\theta_1)+\beta_2Dig_{it}\times I(\theta_1<Dig\leqslant\theta_2)$$
$$+\beta_3Dig\times I(\theta_2<Dig\leqslant\theta_3)+\beta_4Dig\times I(Dig>\theta_3)+\beta_5X_{it}$$
$$+\nu_i+\mu_i+\varepsilon_{it}$$

(4)

式（4）中， $I(\cdot)$ 代表示性函数， $\theta_i(i=1,2,\cdots,n)$ 为待估门槛值，其余变量及符号含义不变。

借助 Bootstrap 法经 500 次计算得到表 8 中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门槛估计值以及表 9 的门槛回归结果。对表 8 数据展开分析可得，数字经济自身并无门槛效应，其与共同富裕之间未呈现非线性关系。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7.168。

表 8 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数	门槛值	F 值	10%	5%	1%
Dig	单门槛	0.322	10.358	11.036	33.261	65.324
	单门槛	0.286**	29.651	8.325	27.652	53.952
MI	双门槛	0.371	14.663	15.014	32.821	64.258
	三门槛	0.507	3.258	10.115	36.391	68.325

分析表 9 可知，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小于或等于 0.286 时，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跨过 0.286 的门槛值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度不同，会导致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产生非线性影响。由此，假设 H3 得到全部验证。进一步地，0.286 大于 -0.015 的绝对值，正向促进作用显著，意味着全国统一大市场促使数字经济正向影响共同富裕的效果更显著。

表 9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共同富裕的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门槛效应	
<i>Dig</i>	$MI \leq 0.286$	0.365*** (5.21)
	$MI > 0.286$	-0.015 (1.01)
控制变量	控制	
<i>con_</i>	1.745*** (5.82)	
个体固定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观测值	2690	
$R^2$	0.728	

通过 Bootstrap 法经 500 次计算得到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门槛值, 结果见表 10。数据显示, 富裕度与可持续发展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单门槛效应, 共享度与共同度则存在双门槛效应(见表 11)。

表 10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门槛值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被解释变量	门槛值	F 值	10%	5%	1%
<i>MI</i>	富裕度	0.694***	43.058	10.281	26.058	40.325
		0.726	6.847	8.546	21.369	30.624
		0.325***	56.129	15.947	34.188	50.365
	共享度	0.614***	48.664	14.524	29.714	47.254
		0.663	7.415	9.074	23.277	42.824
		0.284***	48.321	12.476	23.047	46.814
	共同度	0.426**	35.027	8.614	19.625	42.058
		0.459	3.158	5.814	15.274	37.415
		0.358***	40.845	13.258	24.014	36.824
	可持续发展	0.374	6.288	7.415	16.217	28.412

表 11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的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富裕度	共享度	共同度	可持续发展
Dig	$MI \leq$ 门槛值 1	0.063 (1.02)	-0.057** (-2.33)	-0.054** (-2.25)	0.169* (1.75)
	$MI >$ 门槛值 1	0.314*** (4.50)			0.146** (2.28)
	门槛值 1< $MI \leq$ 门槛值 2		0.071*** (3.65)	0.115** (2.08)	
	$MI >$ 门槛值 2		0.094*** (3.85)	0.077** (2.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_$	1.635*** (6.52)	1.719*** (6.82)	1.302*** (6.71)	1.556*** (5.71)
	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90	2690	2690	2690
	$R^2$	0.652	0.677	0.693	0.654

就富裕度子系统而言, 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小于或等于 0.694 时,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059, 为正但不显著; 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大于 0.694 时,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0.264, 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越高,越有利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增进民生福祉,进而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

就共享度子系统而言,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小于或等于3.625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在3.625~6.714之间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068,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大于6.714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083,同样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事实上,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较高时,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得到有力缓解,带动社会保障“共享式”发展,从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就共同度子系统而言,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小于或等于2.184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054,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在2.184~4.326之间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108,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大于4.326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094,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伴随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攀升,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共同度子系统之间呈现近似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分割情况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城乡协调发展,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就可持续发展子系统而言,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小于或等于3.158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162,在10%水平上显著;当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大于3.158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185,在5%水平显著为正。这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能够推动健康产业稳定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4—2023年全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实证模型系统剖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维度展开了深入探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经济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不过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在东部、中部地区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相比之下,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其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效果则相对有限。其二,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四大子系统均发挥正向推动作用,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其中,数字经济对富裕度子系统影响最大,对共同度子系统与共享度子系统的影响次之,对可持续发展子系统影响较弱。其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具有调节与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可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低于一定门槛值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可提高整体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富裕的共同度、共享度两大子系统,而高于一定门槛值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数则可提高共同富裕的富裕度、可持续发展两大子系统。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效应,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优化共同富裕路径,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居民增收为着力点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如上所述,数字经济可显著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为此,相关部门应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强化经济发展的共享性与普惠性,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一方面,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相关部门需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建设,通过培育更多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重点做好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吸纳工作,以多元化路径增加居民收入。在此基础上,全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缺一不可,要兼顾发展和分配。相关部门需立足按贡献分配的现实基础,加速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健全低收入群体社会帮扶机制。通过上述举措,更好地践行能够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强劲动力。

第二,聚焦结构优化与机制建设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新格局。上述结论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为此,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放大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加快市场结构建设,促进市场结构优化。相关部门应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带动各类要素实现



有序流动。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相关部门可基于先易后难原则,分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市场机制建设,促进公平竞争。一是针对由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引致的恶性竞争,监管部门需统一监管市场,及时监察各类违法违规制定优惠政策的行为。二是要在政策上取消分类管理企业的做法,破除企业等级制管理,按照“中国企业”这一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对所有竞争企业做到一视同仁、条件均等,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强化差异化发展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为此,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政府应立足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持续强化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各地区协调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良好基础。一方面,东部、中部地区发挥先发优势,加速推进现代化、数字化发展,着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有序推进市场统一,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为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应持续强化支持性政策供给,着力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以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整体均衡。在此基础上,西部及东北地区还要积极吸纳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放大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推动作用。

##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mpowe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o Foster the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Insights Based on Regulatory Effects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HEN Huif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es resource allocation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by foster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regional disparities may lead to “digital divides” and exacerbate wealth inequality, necessitating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advance th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69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mposite index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notation. Furthermore, an empirical model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ncorporated as a regulatory threshold variabl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ough heterogeneity exists across regions and among the five subsystems, and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lays a role of regulator and threshold, positively moderating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view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essential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digital reform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mmon prosperity;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覃 俊]